

## · 专题论文 ·

# 亲历清末官制改革： 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sup>\*</sup>

李在全

**内容提要** 《唐烜日记》(丙午、丁未年)记述了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与感受。身为刑官,唐烜亲身经历了大理院与法部的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此过程中,唐氏也完成了从刑官到推事的转变。面对伴随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可谓身已新而心依旧。这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中国首批“新式”司法官的共性。

**关键词** 清末立宪 丙午官制改革 刑官 推事 唐烜日记

随着清末新政朝立宪方向推进,清廷遂有光绪三十二年的丙午官制改革之举。<sup>①</sup>具体到司法体制,此次官制改革中,“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sup>②</sup>无疑,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成为清末宪政变革的理想图景和实践指向之一,组建与传统刑官有别的、独立的、专业化的司法官队伍成为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之一。按官制改革的规定,原先通常称为“刑官”的审判人员,在新设司法机构中改称“推事”<sup>③</sup>,大体相当于如今所言的“法官”。<sup>④</sup>

在丙午官制改革中,从刑官到推事是如何承接与转变的?变与不变分别为何?如果这一转变能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亲历这一变革过程中的人是如何观察并因应的?毋庸置疑,这是中国近代政治、法制转型中非常值得探讨而既存研究中鲜有论述的问题。当然,这需要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由此着眼,晚清刑官唐烜可谓一个典型,其日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历史亲历者的观察与感受。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司法官群体研究”(09CFX008)的阶段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提交2013年5月14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法律史研究群学术讨论会,会上及会下,承蒙诸多师友指点,特别是李细珠、马忠文、吕文浩、周祖文、杜丽红、贾小叶、茹静、邱志红、刘文楠、胡永恒等;匿名外审专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本文统一用旧历纪年,个别之处用括号标出新历。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③ 《法部大理院奏为核议大理院官制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新法令》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9页。

④ 若以分权制衡与官僚专业化观点来看,传统中国自难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官”,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部分厕身刑曹、参与“刑”之运作的官员,大体可以“刑官”称谓概括之。在沈家本论著中,此类官员也是概括为“刑官”,见沈家本《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51—2019页。

## 一、唐烜及其日记

唐烜,字昭卿、昭青、照青,晚号芸叟,咸丰五年生<sup>①</sup>,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丑科进士,以主事用,签分刑部。光绪二十二年任刑部山东司正主稿。三十一年二月任工巡总局发审处委员,五月补刑部四川司主事,九月接充民政部预审厅委员。三十二年四月补刑部福建司员外郎,十月经大理院奏调,次年三月任大理院刑科第三庭正审官,八月奏补推事,三十四年七月调任大理院刑科第二庭正审官。<sup>②</sup> 民国成立以后,唐烜以清遗民自居,依然活动于北京地区,并参加一些公益事业。<sup>③</sup> 1917年以后情况,暂不予考。

晚清时期,唐烜虽为进士出身,且是体制内官员,然由于时局动乱、家族接连遭祸,使其人生经历颇为困苦。在光绪二十七年除夕,唐烜记述了自己经历,忆及许多艰难往事:光绪四年,年24岁时,“值岁大侵,比屋流离,饿殍载道,家无宿粮,糠核不充。春间时疫流行,连遭灭族之丧,情绪尤恶。”是年,年仅19岁的三弟殇亡,这使他“肝肠崩碎,万念俱灰”。<sup>④</sup>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唐父病故,按制丁父忧,又“忽为纤人交构,侮难纷沓,自知罪悼悔,几不欲生。由此贫病无聊,百忧丛集。”同年夏“拳匪之乱作,六十日中炮火惊心,举家槁饿,城将陷,急走郊外,奉先柩浅厝,仓皇回寓,引领待尽,侥幸无恙”。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起复,唐烜不无凄凉地写道:“回忆三载以来,国祸家难,所遭之不幸,有非笔舌所能宣者。”但不幸还没结束,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丁母忧,直至三十年十二月起复。可以想见,虽为朝廷官员,但唐烜经历并不顺利,生活状况并不佳,谈不上富足。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其在日记中道:“前数年窘困万状”,“庚子历浩劫,七八年中几无生人之乐”。如此经历,不免使得唐烜对世事的观察略带一丝悲凉色彩。

综观唐烜在晚清之经历,刑官是其主要职业。此外,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唐烜还“工诗,善书,间作山水画”。<sup>⑤</sup> 在近代(尤其是河北)诗歌史上,唐烜占有一席之地,所著《戊戌纪事八十韵》,收入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sup>⑥</sup> 1917年前后,唐烜印行诗集《虞渊集》,其在自叙中云:“虞渊集者,感清亡而作也”,“以抒予遗之痛”<sup>⑦</sup>,诗风“沉厚老苍”。<sup>⑧</sup>

唐烜早年即有日记纪事习惯,他曾自述:“予自未冠时,即窃有记录。日间趋庭之暇,喜抄前言德行之可则效者,或师友讲习必谨志之,而故家父老过从偶谈旧事,凡岁时之丰歉,方里之变迁,以及土风乡俗之有涉今昔升降之故者,悉缕述无遗。”后因天灾人祸、亲友故去等事,日记曾有间断,但很快又复行纪事。唐言:“迨通籍后,在都门因应略烦,惧有遗忘,辄复逐日登记,然已非复少时

① 唐烜出生年份,其日记所记与履历记载(官年)不一,在此采日记所载,系根据年龄推算所得。

②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417、464页;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页;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47页。

③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1915年5月3日、9月22日、1917年2月8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31、749、777页。

④ 唐烜日记可能存在笔误,未便擅改。

⑤ 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第1147页。

⑥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第177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23—7725页。

⑦ 唐芸海:《虞渊集注》,香港,中国民盟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自叙”,第11页。

⑧ 马国华:《有道平生无党籍,听山余事做诗人——郭家声先生的〈忍冬书屋诗集〉》,《东京文学》2009年第5期。恽毓鼎阅读唐烜所作《虞渊》诗九首后,也深感其诗“感慨苍凉,格调高迈,不期似杜而自近之”。《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1915年7月22日,第741页。

之蹊径矣。”(光绪二十七年除夕)<sup>①</sup>可见,唐氏曾长期坚持写日记。可惜,唐烜日记大部分已经遗失。现今所见日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原名《留庵日钞》,手稿本,共八册: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第二册,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sup>②</sup>;第三册,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七月十二日;第四至第八册,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是连续的。唐烜日记记载了其刑曹生涯、京中见闻、社交应酬及文化活动等。毋庸置疑,该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近代政治史、司法史方面。<sup>③</sup>本文即以该日记为主要史料(尤其是第四至八册),来探讨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与司法变革的观察,及其由刑官到推事是如何转变与因应的。

## 二、改革中的部院筹设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官制改革。次日,派载泽、铁良、戴鸿慈、徐世昌、袁世凯等为官制编纂大臣,著地方督抚端方、张之洞等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并指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sup>④</sup>,参照君主立宪国官制草拟、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在此之前,七月九日,唐烜就听闻,“政府协考查政治大臣并北洋袁慰帅会议新政。传闻已定立宪宗旨,先行厘定官制,内裁九卿,外裁府道州县,官均升为三四品大员,与督抚立接办事”;因是传闻,唐氏也“未知确否”。十七日,即宣布官制改革后第四天,唐听人“谈及近日改官制大略,权之为述天津保定各项新政,及各局所章程”。天津保定的各项新政,即袁世凯主办的直隶新政。庚子事变后,袁世凯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袁氏主政直隶时,推行新政,清廷许多重要举措皆先在直隶试办,然后向各地推广。时人称:“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sup>⑤</sup>因此,在很多官员眼中,官制改革多半是直隶新政的“扩大版”而已。

从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官制改革,到九月二十日新中央官制正式公布,历时两个多月,此间多方角力,政潮涌动。官制改革事关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对其中的种种争斗,甚是关切,唐烜也不例外。七月二十四日,唐记:

连日闻会议立宪及改官制,各大臣因意见不合,屡有齟齬。前数日至有对面喧争之象,亦可见诸巨公之器局矣。立宪之说,唯南北洋两大臣持之最力,皇族中唯泽公言之尤切,枢臣中王仁和相国鹿定兴尚书则反对者也,庆邸徐菊人尚书主骑墙之见者也,荣华卿瞿子玖两协揆铁宝臣尚书则貌似赞成而内实不愿者也。筑室道谋,固今古所同慨,唯以为此大政而以官气躁心

① 文中所引唐烜日记,时间一般是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凡在正文中已经说明时间的,不再另注;若正文未说明,则在文后用括号注出。

② 按时间先后,第二册应排序为第一册,当系文献整理时误识所致。

③ 晚清史研究者对唐烜及其日记应不陌生。孔祥吉先生就利用唐氏戊戌年之日记考证了谭嗣同所写《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并对戊戌维新中其他一些问题做了考察和论证(孔祥吉:《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以唐烜〈留庵日钞〉为线索》,《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收入氏著《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41页;孔祥吉:《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学术界》2004年第1期,收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316—336页。说明:“庵”为“莽”之异体字,手稿本为“莽”字);李细珠先生在研究晚清政治史中也注意到该日记(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但除此之外,学界对唐烜日记鲜有关注与利用。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28—129页。

⑤ 《学员李廷玉臧守义陈宝泉刘宝和陈清震等筹议义务教育办法十四条禀并批》,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11卷,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光绪丁未年版,第2—3页。

当之,遂望旌转乾坤,谁则信之。

唐烜对奕劻、载泽、铁良、王文韶、袁世凯、徐世昌、瞿鸿禨、荣庆、鹿传霖等大员之于立宪、官制改革态度的观察与判断,证诸史实,基本属实。唐烜乃普通京官,无法亲临权力中枢,其获取高层政治信息,大半来自以下三途:其一,报刊(含邸钞等)。晚清时期,对很多士大夫而言,阅读报刊已经成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同为京官的孙宝瑄就说:“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社会人相相应也。”<sup>①</sup>其二,与僚友等交流所得。唐烜日记多次记载,其入署当值或散值后社交应酬时,从僚友中听闻各种资讯。其三,自己对高层政治的观察、判断与推测。虽然自己与清廷中枢相隔较远,无法得知确切信息,但唐烜对清廷高层角力保持关注。十月二十二日,唐再次记述中枢人事纠葛:“上月改官制之旨下,而鹿、徐、荣、铁四人同日退出军机。鹿乃自请解枢职者,荣、铁皆与庆邸不合,徐则连类而及者。噫,国事阽危,而当政巨公争权竞势惟日不足,奈何。”

九月二十日,清廷公布新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当天唐记:“本日已颁谕旨,改定官制。刑部改为法部,并十七司为六司,设一尚书两侍郎。”二十一日,清廷公布中央各部院长官人选,是日唐接记各部院的人事任命。他注意到:共设十一部,外、商、学、警四部堂官仍旧,其他七部更动,其中“左堂沈子惇侍郎改为大理院正卿”,即原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任大理院正卿。当日,唐烜供职的刑部传来音讯,要求各员照常进署办公,“忽档房传知堂谕,嘱署中向来办事诸人,仍逐日进署,切勿观望”。

二十三日上午,唐烜得知自己同乡、同年刘若曾“已实授大理院少卿,为正三品”。<sup>②</sup>依常理推测,唐获悉这一人事任命后应感到兴奋,因为毕竟在司法部门高层有“自己人”,可以为之奥援;但另一方面,唐颇为伤感,因为同年进士者,刘氏已是正三品官员了,而自己此时仅为刑部从五品员外郎。故当十月六日获悉刘氏要调自己入大理院时,唐感慨道:“噫!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偃蹇半生,久已委心任运,无志腾骧。”不过,感慨归感慨,在官制改革前后唐烜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出路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二十四日,新任法部尚书戴鸿慈到任。这一天,唐烜赴北京西城刘若曾宅贺喜,可惜未遇;他还出城至戴鸿慈宅、沈家本宅道贺,并到各处“投刺”。这时,唐烜观察到:“连日各衙门司员,衢巷过从,马烦车殆,类皆营谋求乞,关心得失,大有昔年秀才望榜情景。”显然,官制改革搅动了整个官场,官员们开始为谋缺图位而奔走了。十月三日,唐烜入法部署,堂官谕令“各司员写具履历”,唐发现“同司诸君到者七八人,皆向不入署者也”,很多平日不上班的人员,在此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候都现身了。

十月六日,唐烜从一位自刘若曾宅来的友人口中得知刘将调往大理院,“意甚欣动”。同日,唐到法部署,同僚梁星秋员外郎“过司相访,极意挽留;而中鲁说项,求调院官,并代予筹划一切。”这里点出关键所在——“中鲁(即刘若曾)说项,求调院官”,并“代予筹划一切”。可见,唐烜由刑部转调大理院,大理院少卿刘若曾是关键人物。唐烜随即往四牌楼访刘,“谈许久,留晚餐,二更后始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7页。

② 刘若曾,字仲鲁(唐烜日记中有时记为“中鲁”),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南长沙府知府、考察各国政治大臣参赞、大理院少卿(代理正卿)等职。民国以后,任直隶民政长、北京参议院参政等(参见王树楠《清大理院正卿刘公及配刘夫人合葬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页)。刘若曾与唐烜同为直隶盐山人,均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乡情年谊兼备;通观唐烜日记,亦可见刘唐关系非同一般,详见下文。

归”。从日记记载来看,这是官制改革正式公布后唐第一次见到刘,二人相谈甚久,想必谈到唐调任之事。唐还在刘宅看到“官制节略并法部大理院官制清单,共十二部五院”,若非亲近之人,刘一般不会出示这些文件,由此可佐证刘、唐关系非同一般。在看到官制清单后,唐认为:“设官应较旧制加数倍,十年之内恐难实行。”十三日,唐又访刘。

除刘若曾这一因素外,以唐烜自身条件来看,他应该既可留任法部,也可调往新设的大理院,但唐最终还是决定调任大理院。对官员而言,调任无疑是大事,唐本人也是经过反复权衡后做出决定,可谓谋定而后动。唐烜如此选择,一个不可能不考虑到的因素是,在新设衙门升迁较为容易,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恽毓鼎就观察到:“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麋集犖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sup>①</sup>御史徐定超在一份奏折中道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旧衙门各员有二三十年不得补缺者,新衙门则一二年即可补缺。”<sup>②</sup>其实,官员喜进新衙门的现象,存在于整个清末时期。清廷最高层也清楚这点,宣统元年,上谕就承认:“近年新设衙门、新建省分往往多坐此弊。”<sup>③</sup>从这种整体的官场状况来看,自然就不难理解唐烜最后决定调往大理院。唐本人也承认:“建设新署,凡涉于行政司法者,皆以为终南捷径。”(十月九日)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唐烜被大理院奏调,但并未补授实缺,底缺仍在法部<sup>④</sup>,因此,他得部、院两头跑。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到三十三年上半年,大理院与法部均在筹建中,故唐烜亲历了院、部筹设过程。

十月十七日,大理院上奏调员名单,唐烜获悉这份名单中“所调人员,共四十一名”,他本人也名列其间。其实,唐早就知道此事,故称“此事在二十日前已有所闻”。调任大理院已属既成事实,于是,次日唐烜前往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宅“道谢,递名刺而归”,之后,还往刘若曾宅,但未遇见。几天之后,报纸公开了这份名单,这些人绝大多数调自法部;按照大理院的说法,调人以“熟悉律例,才优听断者”为原则,但事实并不尽然(详下)。关于调任程序与方式,大理院奏请援照学部及巡警部成案,即“毋庸开去差缺,遇有升转仍因其旧,俟臣院奏补实任后,再行照例办理”。<sup>⑤</sup>易言之,就是暂不开去原衙门的缺位,一旦有机会升转,可照旧进行,等到该员在大理院补缺后,方再按照程序办理调入手续。二十二日,唐烜赴大理院,谒见两堂官,发现“法部所调各员均到”。其实,这只是大理院第一次大规模调员,后续不断有调员举动,其中,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大理院再次大规模奏请调员,奏调多达44人<sup>⑥</sup>,大部分依然调自法部。

大理院设录事官缺,加上总检察厅共34名,“掌缮写文牒、承办庶务”,秩八、九品,委用官。<sup>⑦</sup>录事以考试方式招收,而唐烜则参与其事。十一月十四日,一位欲参加录事考试的熟人来咨询唐烜,“欲捐监投考”,唐一面“怂恿之”,一面也担心“此事院长极为郑重,职数甚隘,恐不易获隽也”。两天后,唐在署内听闻,考试定于二十日在法律学堂举行,报名者达“百余人”。二十日,唐赴法律学堂,发现“与考者共三百余人”。据《大公报》报道:入考者二百八十余名,且由沈家本亲莅考场命题考试,试题为“法者,天下之仪论”。<sup>⑧</sup>此后几天,唐烜参与阅卷事宜。

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② 《徐御史奏请划一部院规划》,《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第1张第3版。

③ 《吏部奏酌拟考核调用人切实办法折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页。

④ 这是官制改革中通常的做法,详见下文。

⑤ 《大理院奏请调用司员》,《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六日,第1张第3版。

⑥ 《大理院续调司员》,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第3版。

⑦ 《法部大理院奏为核议大理院官制折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2卷,第122页。

⑧ 《考试纪题》,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版。

大理院招考录事之事,舆论颇为关注。《大公报》还进行连续报道,认为大理院此次招考录事“所订考规极严”,规定:吸食鸦片者、楷书不精者、不谙大清律者、无切实保结者,凡具一项者“概不录取,以免贻误”。<sup>①</sup> 初试名单出榜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复试,考取人员“一律自呈本身照片一纸,并须出结官亲往识认,其系贡监出身者,均于复试之日呈验各照,以昭慎重”。<sup>②</sup> 十二月十三日,唐记:“大理院知会明日录事复试监场”,次日,“复试录事 138 名,临点不到者 4 人,扣年貌不符者 1 人”。复试后“共取一百余名。先传五十名入法律学堂肄业六个月,然后到院办公。其名次列后者,须第二次传到。”<sup>③</sup>

《大公报》公开、连续报道大理院招考录事,实非大理院堂官所乐见,因为此事他们本不想对外公开。唐烜说:大理院两堂之原意,即不采学堂开考方式,因为这次大理院招人甚少,“若出示招考,则千数百人不止”,很多应考者“远路迢迢,徒劳资斧”,可谓劳民伤财,“故而各司员告知,嘱其转告外人”。换言之,此次招考对内是公开的,对外则没有公开。即便如此,报考者也多达三百余人。此举,外界“皆臆度院署堂司引用私人,不肯早日宣示,仓卒定职”,唐烜认为:“平心论之,似觉非礼,无怪时议笑也。”(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理院附设看守所,须招考所丁。沈家本拟招募狱卒数十名,“飭令附入法律学堂演说监狱大义及看守规则,以期改良监狱”。<sup>④</sup> 报名条件是:年龄在 30 岁以下,不吸洋烟及无他项嗜好,能写认 500 字者。<sup>⑤</sup> 但此事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唐烜入大理院署,上堂商议监狱事宜,原拟先传考取所丁 60 名入署当差,问题是这些人员“皆系生手,茫然不知看守犯人为何事,殊难经理”。沈家本转而打算调取民政部巡捕十数名以行守卫兼巡护之责,但民政部巡警厅长官不愿担此责任。这时,唐烜建议:可与民政部堂官及厅丞等人商量,仅借用数人,由大理院发给饷项,然后令他们教习新考取的所丁,两月分班再调取,如此“或可徐徐收效”。对唐氏的建议,沈家本“颇为首肯”。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唐烜至大理院,“观吏役搬移什物往工部新署”。丙午官制改革中,工部并入农工商部,几经周折后,工部衙署成为大理院办公场所。次日,唐赴大理院新署,“上堂谒见,一揖贺喜。又刊出同官录,均令自己填写籍贯、出身及原衙门、原阶级并院中奏调日期、到署日期。”二十八日,大理院“各差已由堂点派”,大理院分四处六庭:详谳处、当月处、庶务处、收发处,刑科四庭、民科二庭。唐被点派为刑科第二庭审判官(后在刑三庭),兼在详谳处行走。

除大理院外,唐烜也亲历了法部筹设过程。据《盛京时报》报道,法部尚书戴鸿慈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考试部中各司员,“逐日同棹研究各司案件应如何判审为去留之分别。近日已然考过数司,视此法部颇加整顿以免滥竽充数。”<sup>⑥</sup> 二十九日,该报接续报道:刑部自改法部之后,“所有大小司员尚无一定位置,顷由该堂官议商,拟将各司员分别考试律例以定去留,刻正逐日传考,俟考试后必有一番更调”。<sup>⑦</sup> 法部考试司员确属事实,但内中实情外界报纸并不尽详。十月二十五日,唐记:“连日署内堂官面考各司实缺人员”,但考法颇莫名其妙,“闻系绍任廷侍郎<sup>⑧</sup>主政,

① 《严定考规》,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4 版。

② 《定期复试》,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第 5 版。

③ 《录事复试揭晓》,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第 5 版。

④ 《狱卒入堂》,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第 4 版。

⑤ 《出示招募》,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第 5 版。

⑥ 《戴尚书整顿法部》,《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第 2 版。

⑦ 《法部考试司员》,《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 版。

⑧ 绍任廷,即绍昌,时任法部侍郎,主持此次考试。

每人各一题,即照律例各门中摘取一二句,被考者往往不能成幅,盖门类条件太繁,不独素未披览者茫茫莫解,即日理刑名者,亦难随举无滞。合署实缺人员往往有终年不到署者,因此,颇为苦。”<sup>①</sup>显然,如此考法,即使精于刑名者也无法应考,何况终年不到署者。故而有人当场对此提出质疑。②当日轮考到福建、浙江两司,唐烜系福建司实缺官员,但他没参加考试,唐解释说:当日到署,本拟参加考试,但一位同僚对他“谈及此举,大不为然,并力阻予行,遂作罢”。唐以外还有很多司员未参加(或曰拒绝参加)考试,唐就听闻:福建、浙江两司参加考试者仅有六人,“盖不到者居半也”。如此一来,法部堂官初始意图自然大打折扣。

十一月七日,唐烜从也是由法部调任大理院的同僚治良口中获悉:唐未与考,“堂宪意颇不悦”,后来又得知“治君亦未与试,堂宪又传其补考,殊可骇怪”。然而,唐烜像其他很多司员一样,最终还是参加了考试。十二月九日,唐记:“自改法部后,即调考署中实缺候补各司员,无一能免者。予初次未到,至今日阖署已考讫矣。有未预考者九人,堂谕补行接见。”但事实上,在考试时,唐烜与另一名同僚(陈华圃)只走个过场,因为主持考试事宜的法部侍郎绍昌是唐烜的己丑进士同年,绍昌当场说:“诸君中,陈老(即陈华圃)即系山西司主稿,逐日晤谈可勿庸与考;照青(即唐烜)同年,亦天天入署办事者”,故此二人可免考。可见,官制改革过程中很多部院所举行的考试,人情、关系等因素在其中作用很大。

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确定后,各部院须议定官制。法部起步其实不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法部就着手改订官制,派司员十余员,“公同会议,其他满汉档房各员均可随时呈递说帖至该部”。<sup>③</sup>但与其他部院相比,法部此后的官制改革进程颇为迟缓,如裁撤书吏工作至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仍未进行<sup>④</sup>,因此,作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时任法部尚书的戴鸿慈受到两宫责斥。受斥责后,戴氏迅速推进官制改革进程,次日到部,“催促与议官制之司员赶速拟稿,呈堂入奏”。<sup>⑤</sup>十二月十八日,法部奏核官制,并陈明办法。<sup>⑥</sup>唐十九日记载:“闻昨日法部正班已奏定官制”。至二十五日,法部尚书、侍郎之下的主要官员得到任命:左丞定成,右丞曾鉴,左丞参余肇康,右丞参王世琪。在主要官员人选确定后,光绪三十三年一月,法部开始着手整顿“书吏刑皂狱卒”。戴鸿慈认为:法部“书吏刑皂狱卒人等盘踞多年,素为人民所切齿,急宜迅速裁撤以符新制”。为此,他训示各司员:法部官制已经制订,“君等宜躬亲庶政,不得假手书吏,否则查出定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也”。<sup>⑦</sup>法部是司法行政机构,虽不再掌理审判事务,但也要求办事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即“虽无法律专门之学,亦颇知法律为何事”,但很多“旧有各员直连法律二字且不解,实难敷衍迁就”,因此,戴氏奏请把“旧有各员严加裁汰,或年轻新就捐班;或年老颓唐太甚者一律开差,仍给原俸,以资体恤;其稍堪造就者,即飭入律学馆肄业”,获准办理。<sup>⑧</sup>

光绪三十三年二、三月,法部在奏折中说明:原刑部“向来差与缺分,实缺之员不尽办事,并有常不到署者,虚名徒寄,迁就滋多”,如今“既分职掌而专责成,欲严杜乎滥竽”,势必改弦更张;加之,法部实缺人员“经各衙门奏调者不少,而以大理院奏调为尤多”,这些现今在其他衙门办事的人

① 徐一士著,徐禾选编:《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0页。

② 《法部自议官制》,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八日,第3版。

③ 《裁撤书吏之确息》,《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四日,第2版。

④ 《两宫催法部改制》,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4版;《戴尚书召见被斥》,《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1张第1版。

⑤ 《法部奏核议法部官制并陈明办法折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2卷,第106—109页。

⑥ 《法部裁吏先声》,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第3版。

⑦ 《法部澄清吏治》,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日,第4版。

员仍然占着法部缺额,“以本部之员办他署之事,势必多数派署,与明定职掌之义不符”。鉴于此,法部奏请:“凡经各衙门奏调的法部实缺人员,‘一律开去原缺’。”<sup>①</sup>三月,法部司员实缺开去六十多人。<sup>②</sup>法部的人事变动,牵动着唐烜的神经,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二月二十日,唐获悉“(法)部中将于廿七日奏补各缺”;三月十八日,“闻法部已揭晓矣。日前正班奏补各缺,其中得失不一,欣戚悬殊,盖缺望者多矣。”四月法部奏补员缺,被大理院奏调各员“均开底缺”,因此各司员“颇多观望。”<sup>③</sup>如此一来,唐烜在法部的底缺就被开去,完全成为大理院的人员了。很快,法部奏补司员清单公布。<sup>④</sup>至此,法部人员大体确定。

### 三、部院之争

官制改革中,由于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各部门之间不免发生争端,其中,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争执(法律史上谓为“部院之争”),尤为引人注目。关于部院之争,目前学界已有较多研究<sup>⑤</sup>,但仍存进一步申论之可能与必要。作为亲历者的唐烜,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对此事件的观察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无疑,这将深化对该事件的认识。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唐烜听闻,法部将于二月一日把所有已结、未结案件交大理院接办。十天之后,他在二十六日写道:

连日闻大理院与法部为交代事大起龃龉。董绶金员外康与曾焕如右丞鉴,至亲面诟厉。盖法部新放之左丞定振平成者,原由刑部出守兖州,内升少卿,其在刑部掌印时,亦颇有能名,性最喜事专以舌辩竞长,又与新政反对,故自到任后,极意挑拨致起争端。而董君又自许名士,近甫自东瀛考察法律回国,方欲矜能见好,不顾大礼,盖皆逞一己之私见而忘协恭之大谊。持之簪笏,识量不啻儿童。近日号称能事者,大抵如此,其奈之何哉。本日本法部大理院奏请展限一月,再行交代,盖原定在二月初一日,因迁署事,争执不下。原拟大理院移用法部旧署,而法部移入工部之署。兹闻前议尽翻,旧署归两处,中剖分用,将来必益多轳轳也。

“董绶金员外康”即董康,原任职于刑部,此时调入大理院,为沈家本倚重之人;“曾焕如右丞鉴”即曾鉴,时任法部右丞;“左丞定振平成”,即定成,时任法部左丞。<sup>⑥</sup>据日记所载,唐烜也是事发几天后才听闻大理院董康与法部曾鉴争执之事。据《盛京时报》报道:“法部大理院之冲突萌芽于秋审处之团拜。缘正月二十日法部秋审处诸员借湖广会馆作团拜,是日曾君鉴与董君康大起冲突。”<sup>⑦</sup>目前学界对部院之争研究,也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的曾董之争为冲突公开化的起点,但此外的信息语焉不详。上述的一月二十六日唐烜所记至少提供了以下两点信息:曾、董之外,尚

① 《法部奏改补员缺分别补署并详陈办法折》,《大清新法令》第2卷,第110—112页。

② 《法部司官六十余员开缺》,《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第2版。

③ 《法部奏补员缺》,《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第1张第3版。

④ 《法部奏补司员清单》,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日,第4、5版。

⑤ 很多中国近代法律史论著对“部院之争”有所论述,如朱勇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张从容《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中,张著的研究最为精审。

⑥ 据《法部官制》,法部左丞、右丞是仅次于尚书、侍郎的重要官员。

⑦ 《法部大理院之冲突已平》,《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第2版。



有关键人物——定成<sup>①</sup>，他是既存研究中未曾关注的人物；既存研究多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权限划分的角度加以考察，此固属事实<sup>②</sup>，但在唐烜看来，部院之争首先是“人”的问题，无论大理院方面的董康，还是法部方面的曾鉴、定成，都是“所用非人”，因此，唐在同日的日记中，用很多笔墨记述“王安石变法”中的用人问题，这是既存研究尚未注意到的考察视角。

曾董之争，背后反映的是部院堂官的矛盾。事实上，法部与大理院的堂官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而非一般认为的双方关系伊始即不洽。三十二年十月《大公报》报道：“顷得确实消息，法部大理院二署办事权限刻已由各堂会议划清。嗣后凡有关于司法之事，均归法部；其一切行法事宜，统归大理院管理。其法部衙署则以工部旧署改充，大理院衙署即占刑部之官廨也。部院各堂已决意照此举办矣。”<sup>③</sup>可见部院分设之初，双方并无冲突。这点在唐烜日记中也得到证实：“去岁法部与大理院堂宪均甚融洽，所有权限建置等事议定奏闻，并将法部旧署让大理院，而法部迁至工部，限三月后交代……年前大理院奏调法部人员，皆两署密议，并无违言。”（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显然，无论是权限划分、公署分配、人员调任，部院之间起初都能协商解决，无甚芥蒂。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部院堂官关系颇现微妙，《大公报》报道：“法部三堂初接任时，因沈子敦大理（即沈家本）系刑部熟手，故一切公事皆就沈商酌。现在因权限上之问题，法部与大理院两处堂宪颇有意见。”<sup>④</sup>部院堂官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体现在所属司员之间，故次年一月曾董发生争执，就不足为奇了。

部院之争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但受实际影响最大者，还是唐烜这样已被大理院奏调但底缺仍在法部——夹在部院之间——的人员。因此，唐烜对部院之争非常关注，且深感焦虑。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唐记：“近日法部与大理院相持颇急，外间亦有所闻”，托人“探问此事原委”。二月五日记，“近日法部奏调人员事。去岁大理院初设，先调法部三十余人，近又续调十数人。而法部因与大理院齟齬，又将先调人员奏留十数员，以致人情惶惑，不知所届，殊可叹也。”十二日记，“与法部风波未平，各有意见”。次日记，“连日北京报纸论说中，议及法部大理院之风波，语颇中肯。此事已通国皆知，而两署司官之好事者，方拚拨不休，可叹也。”

在唐烜看来，部院起初关系融洽，但“自年前法部简放丞参，遂会议交代事宜，骤生齟齬，以致嫌隙愚不可解，移署之议，既为画饼。近在江苏馆会议，专为民政部移交预审厅事宜，而法部堂派新参数人前往，力持梗议，意在地方裁判及区裁判，一切官制仍归法部管理。其无理取闹横生波折，识者皆谓曲在法部云……正月内又续调十八人，近日法部忽调回，大半意在构衅……阖署人心惶惑，已有瓦解之势。”（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唐烜所言，部院之争后“阖署人心惶惑，已有瓦解之势”，确属事实，但谓法部“无理取闹横生波折，识者皆谓曲在法部”，则是唐（亦可认为是大理院一方）的一面之词，未可尽信。

事实上，在外界看来，道理多在法部一方，而非大理院一方。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盛京时报》报道：“大理院自议订新章以来，极力推广权力”<sup>⑤</sup>，从报道中用“极力推广权力”之措辞可见

① 定成，字镇平，满洲正蓝旗人。光绪九年癸未进士，签分刑部主事，后外放山东兖州。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任太常寺卿，三十二年九月裁缺，改任法部左丞。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署理大理院正卿，十一月补授，宣统三年十一月去职。

②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大理院上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且奏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大理院对各类案件的司法权限；大理院及其直辖京师各级审判厅（即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城内外地方审判厅、京师分区域藏局）的组织结构与管辖权限；大理院除拥有自身的司法行政权外，还拥有京师各级审判厅的筹建与人事权等（《大理院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大清新法令》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7—379、380—385页）。很明显，在司法审判权之外，大理院还拥有本应该由法部职掌的部分司法行政权，即部院之间权限存有交叉，这为“部院之争”埋下伏笔。

③ 《划分司法行政权限》，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八日，第3版。

④ 《法部最近之调查》，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第3—4版。

⑤ 《法司衙门力争权力》，《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第2版。

外界对大理院的不以为然。二月十七日《申报》报道:“大理院欲将中下级裁判暂归大理院管理。法部不允,谓此系司法上之行政,应归法部,不应归大理院,大理院只管裁判而已。虽司法应独立,然大理院只能自己独立,不能管中下级之裁判,亦须独立,所谓裁判署层层独立也。议者皆谓法部之言为是。”<sup>①</sup>显见,舆论更多站在法部一方。从法理上分析,作为最高审判机构的大理院职掌的是司法审判权,法部职掌的是司法行政权,国家的中下级司法机构的筹设事宜理应由法部掌管。这就不难理解,当二月三十日法部尚书戴鸿慈致函在日本的梁启超说明部院之争情事时,与此事本身没有瓜葛的梁启超也认为:将“一切用人行政区划审判区域修律各事,皆作为该院权限,恰恰倒置也”;“此事之曲,却不在法部,而在大理院”。<sup>②</sup>

部院之争有所起伏,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法部似乎有所让步。二月十六日,大理院刑科推事文需就对唐烜说:“本日谒法部张侍郎(即张仁黼,引者注),为中下级裁判接收事,渐有和平处置之消息。”二十五日《盛京时报》也以《法部大理院之冲突已平》为题,报道:“今闻法部堂官已将高等裁判、地方裁判等事俱让归大理院主持,于是风潮平息矣。”<sup>③</sup>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法部多半认为,若就此妥协,事关权限划分等制度(核心)问题,于己不利。这段时间,法部应在多方探听、搜集于己有利的理据。前述戴鸿慈致函远在日本的梁启超,询问到底如何划分法部与大理院权限及部院关系等问题,应即其中一举。在得到理据(可能就包括梁启超回函)后,以戴鸿慈为首的法部决定,各级裁判等事宜不归大理院管理,并草拟《法部奏酌拟司法权限折(并清单)》。<sup>④</sup>该折上奏日期虽然标写是“四月三日”,但在此前,作为争执对手方的大理院其实已经获悉大概(注意:部院之间人员相通,信息亦相通)。因此,在三月二十三日,唐烜记:“本日在署,闻地方裁判事宜,法部仍向政府争执须由部管理。日前闻院中官制业经政府画诺矣。忽庆邸索阅,又送军机处,交法部看详,事遂中变。将来恐不免重起风波也。”这条日记至少透露了以下信息:其一,“地方审判事宜,法部仍向政府争执须由部管理”,一个“仍”字,说明此前法部已经向大理院(可能也包括军机处)争取过,但未果,现在再次争取。其二,庆邸介入此事,这是既存研究中未曾提及的环节,当然,庆亲王奕劻介入此事多半非出于政争考虑,而很可能是此时已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部院之争,引起他的注意。“忽”字值得注意。其三,法部于四月三日单独上奏该折,未与大理院会奏,但包括奏折内容等信息事由,大理院方面是了解的(当然可能不充分),所以,在法部还没有正式呈奏之前,唐烜就预感“将来恐不免重起风波也”。

果不其然。四月三日,法部上《奏酌拟司法权限折》并附清单,不仅要求地方裁判厅的筹设权,而且要求人事权,对于大理院的推丞、推事及总检察厅检察官,大理院也要会同法部奏请任命,此外,还要求拥有重罪复核、监督审判机关等权。如果说,法部在此前的部院之争中处于守势,那么,此奏以后,则转入攻势。无疑,法部此折使部院之争进一步升级和公开化。四月七日唐记:

是日,座中许际楼、周林叔(即许受衡、周绍昌,引者注)两提调均到,谈及近日部院为官制事又起冲突,各抱不平。盖上次正班之前数日,大理院所订官制已送至军机处,经合王大臣画诺矣。忽庆邸索还覆阅,径交法部。法部各堂大愠,谓院订官制未曾与部会商,仍争监督之权,遂独上封奏,以大理院由五品推事以上之官,将来补署须由部会奏,而自高等裁判以上皆由部

① 《法部大理院之意见》,《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第1张第4版。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250页。

③ 《法部大理院之冲突已平》,《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第2版。

④ 《法部奏酌拟司法权限折(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1卷,第368—371页。

设置,拟有章程十二条,已奉旨依议。是大理院不得为独立衙门,以权则牵制,以事则窒碍,而所谓更张者,非徒无益,反致贻害,较之从前不过多耗国用耳。噫,中国变法之代多矣。今尽付之若而人者,是固曾布吕惠卿所不屑,而适与无事自扰之语相合也,惜哉。

面对法部的出击,以沈家本为首的大理院也只好应战。他们草拟《奏谨就司法权限酌加厘订折》,于四月十二日上奏。在奏折中,沈氏希望部院双方能相互“见谅”,在关键的权限问题上,沈对法部前述清单中的第一、五、六、九条提出异议,认为此四条款必须“重加厘订”。此四条款的关键是死罪重案复核权和大理院人事权。关于重案复核权,沈认为“法部只能监督裁判,处理其司法上之行政事务,不能干涉其裁判权”,法部“并无驳审之权”,但基于现实考虑,沈还是提出了“通融办法”;关于大理院(包括总检察厅)人事权,沈以“今日开办伊始,应由臣院请简奏补,以一事权而免贻误,异日法学材多,法部编制法纂定颁布,自可部院会商,公同奏请”。<sup>①</sup>显而易见,此番大理院让步良多。

面对部院之争,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要求部院“和衷商办,不准各执意见”。同时,清廷下令把大理院正卿沈家本与法部右侍郎张仁黼对调。<sup>②</sup>此举大为出人意料。唐记:“闻沈大廷尉调法部右侍郎,而张劭予侍郎调大理院正卿,为之愕然。盖政府又为此调停之见也。夫大理院既专司裁判,岂可以书生学究不知名法之人,厕其间乎。真令人无从索解矣。各庭人情惶惑,散值甚早。”(四月十二日)唐所言“为之愕然”、“无从索解”、“人情惶惑”,真切地道出部院之争时大理院人员的心态与情状。根据清廷训示,法部尚书戴鸿慈与新任大理院正卿张仁黼于四月二十日会奏《遵旨和衷妥议部院权限折》<sup>③</sup>,部院权限得以大体划分,部院之争告一段落。

部院之争虽告一段落,但对清廷以堂官对调的“平衡术”止息部院之争的做法,时人也多感莫名其妙。被盛宣怀派驻北京刺探政情的陶湘,致函盛氏云:“大理院与法部因争权限事,屡烦两宫之劳顾。昨忽以沈张对调,乃请君入瓮之意。事固高妙,而臣下之办法愈难,政治终无起色。”<sup>④</sup>《申报》报道:“调沈家本之补法部侍郎也,朝廷以沈在大理(院)时于独立审判,持之甚坚,乃调法部,俾弭部院之冲突。然意见之是非可以调停而解除之,政体之是非不可混合而两全之。”“吾推朝廷之意,谓沈既调回法部,则自为法部计,决不至再分畛域。岂知沈所争者,为大理院也,为法部也,非为个人之位置也。个人之位置可朝东而暮西,法部大理院职掌所分断不能强彼以就此。”<sup>⑤</sup>显而易见,时人多认为清廷此举只是治标之策,没有解决事关政体、制度、权限划分等根本问题。

综观唐烜对部院之争的观察,不难发现,他较少从制度设置、权限划分的角度着眼并分析,而较多从“人”的角度看问题。与同时期很多较为“开通”的士大夫相比,唐烜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方法不免有些“落后”。这时任职于邮传部的孙宝瑄也注意到官制改革中存在的权限纠葛问题,他认为:“今朝廷革官制,厘权限,期清界域不相侵;而诸部院行政范围,犹视其长官之强弱为广狭,强者往往横溢其势,虽涉人之藩不顾。弱者含忍,不敢与争,乌得云平,是固当置权限争议裁判矣。”显然,孙氏不仅看到“人”的问题,而且立即想到应设立“权限争议裁判”(颇似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解决此问题。当孙氏调任大理院“行走”后,他再次关注到这一问题,依然认为应设“政治裁判”。<sup>⑥</sup>无疑,孙宝瑄的观察与解决之道比唐烜“先进”,也符合现代法治的原则与方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

① 《大理院奏谨就司法权限酌加厘订(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1卷,第371—37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69页。

③ 《法部大理院会奏遵旨和衷妥议部院权限折(并清单)》,《大清新法令》第1卷,第375—376页。

④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转自李贵连《沈家本传》,第240页。

⑤ 《沈家本蜀为而入法部乎》,《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第1张第2版。

⑥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十一月十一日,第1004—1005、1116页。

了身处新旧变革时代的唐烜,总体上仍属传统刑官的范畴,而非能从制度、规则、权限角度分析矛盾纠纷的现代司法官员。身已在新时代,心则停留于旧社会。

#### 四、新旧之间的司法变革

丙午官制改革中设立的大理院,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司法审判机关。其人员主要来自法(刑)部、原大理寺及其他各衙门,但大部分来自法(刑)部。<sup>①</sup>至光绪三十四年,大理院人员基本完成配置。在清末大理院这个司法机构中,宣统元年之前奏调的人员构成其“基本盘”。这可在唐烜日记中得到证实,像唐烜这样的原先在刑部任职的实缺刑官相当部分都被奏调到大理院成为实缺推事。

清代刑部官员,大多为科举出身的士人。科举的知识与刑官的知识颇为不同,科举出身的士子要想成为合格的刑官,必须进行知识更新和必要的专业训练。董康撰文道:清代学校科目,“一以经义及策论为主,并缺律令一课,固无足称为法律教育”;刑部官员大多为进士或拔贡小京官出身者,签分到部后,要“一方读律,一方治事”。<sup>②</sup>曾任晚清刑官的许世英在其回忆录中也证实这点。许氏由拔贡签分刑部后,除了审理案件,还要校读刑部尚书薛允升编的《法律全书》。<sup>③</sup>换言之,一面研习《大清律例》等,一面进行司法实务训练,藉此,一位士子才可能被造就为一名合格的刑官。当然,终身不得门道者也不少。清末御史陈善同就指陈:“刑部司员必在署读律办案十余年,方能确有见地,然尚有终其身而不得门径者。”<sup>④</sup>这些以传统律学知识为主的刑官,在接触现代法政知识、进入新式司法机构后,如何反应并应对呢?

辛丑议和后,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清廷设立京城善后协巡总局,办理京畿善后营务和巡捕等事。二十八年四月设内城工巡局,三十一年七月又设外城工巡局,下设发审处,沿原先五城理讼之例,办理词讼事宜。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巡警部设立后,“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务,均归管理,以专责成”,内外城工巡局发审处改为内外城预审厅,由部直辖。次年九月,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内外城预审厅改隶民政部。内外城预审厅掌民事、刑事案件,办理词讼事宜。有关民事重要案件,随到随结,如遇流徒以上重案,则须先由预审厅讯明情由,再咨送刑部办理。大体而言,其相当于京城地方的初级司法机关。<sup>⑤</sup>大理院成立后,原属民政部的内外城预审厅逐渐裁撤,有关案件移交大理院。

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唐烜先后充任工巡总局发审处委员、民政部预审厅委员,缘此,唐氏亲历了京师地方初级司法变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唐记:“刻内城已设预审厅,置正审官、诉讼审判官、记事官各一员”,同日唐“写一片付班役带至东城臬局请假五日”,并自道“予久不乐为此,拟趁此数日辞差矣”。事实上,唐并未辞差。九月十四日,唐说:“臬局自改预审厅后,凡词讼分民事刑事。近日新章又定为审判诉讼法,归入民事者,到案两造均立而不跪。自此审判之人更觉纷

① 《大理院为本院奏请试署推事各缺期满各员补授事致民政部咨文》(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1509/6/002.006。

② 董康:《我国法律教育之历史谭》,何勤华、魏琼编:《董康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页。

③ 许世英:《许世英回忆录》,台北,人间世月刊社1966年版,第29—36页。《法律全书》之书名应有误,多半系许氏晚年回忆不确所致。

④ 《御使陈善同奏各省审判检察等厅遇事冲突受诉推诿请飭严切考核等片》,《政治官报》第1342号,宣统三年闰六月一日,第8页。

⑤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92页;朱先华:《清民政部简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9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7、284页。

扰矣。”显然,长期担任刑官的唐烜对这种新式审判方式预感不佳,不甚适应。其实,不仅唐烜感觉如此,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也认为:“中国民俗浇薄情伪万端,莫可究诘,将来国中遍设裁判,一切仿照西法,而刑讯已停,有裁判之责者,恐不免棘手也。”(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面对新式司法,唐烜虽不甚适应,但现实还是要面对的。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八日,唐烜收到一位名叫“刘韵生”的人自日本寄来“新译法政书一册”;次年一月十八日,又收到“刘韵生自东洋寄到早稻田学堂讲义一册”;三月九日,再“接刘韵生由东洋寄来法政讲义一册”。刘韵生为何不断向唐烜寄来新学书籍(主要是法政类),由于此前日记已遗失,不得而知,很可能是此前唐烜向刘韵生交待过此事,所以才不断寄送。由此可大致推断,唐烜是有意于了解新式法政知识的。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当一位从日本归来的友人“谈东洋风土”时,唐便觉“甚可听也”。可见,政治上保守的唐烜,其实并不排斥新式法政知识,也谈不上反对司法改革。这样的人当时应不少。同为京官且与唐烜有交往的恽毓鼎对新式法政知识就持开放态度,并有相当了解。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当友人从日本给恽氏寄来新译《法政粹编》17种时,恽就认为“殊有实用”;七月,恽氏在日记中道:他将专攻法律之学,依次学习宪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附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当友人将宪法编成20卷赠给他后,他表示“余须破除各事,尽三五天之力,仔细斟酌。在家苦烦扰,拟逐日到局,专意看书,亦借以研究法学也。”<sup>①</sup>从这一角度观察,此时的中国士大夫,已经很少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守旧者了,“变”成为国人的共识,有别的只是如何变及变之轻重缓急。

晚清时期,废除严刑酷法的呼声不绝于耳。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明确提出“恤刑狱”主张。<sup>②</sup>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改订旧律、草拟新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使《大清律例》经改订后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参与修律事业的董康后来回忆说,修改刑律的主要工作为三项:废止凌迟枭示、免除缘坐、废止刺字<sup>③</sup>,简言之,修订《大清律例》的主旨是删除其中的严刑酷法。沈家本等人不时将新拟刑律上奏,清廷让官员们提出意见。身为刑官的唐烜对这些新刑律很关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当他看到一位广西官员逐条驳斥新颁刑律的奏折后,认为此折“极有见地,逐件指斥其窒碍不可通者,语意尤周到”。这反向表明唐对清末法制与司法改革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持此类观点的官员应不少,即使是对新旧知识均有了解、视野开通的孙宝瑄,也持与唐烜类似的想法,认为:“凌迟之刑,古无有也,始于五代,沿宋、元至今,始一旦除之,甚盛举也!然有穷凶大慝,一人而伤多命,仅断其首不足蔽辜者,似宜留是刑以待之,方满人意。国民程度未进,徒轻其刑,亦无益也。”<sup>④</sup>换言之,刑罚必须与社会、“国民程度”协调,在社会条件未备时,贸然废除严刑酷法未必可取。这足以提醒近代法律史研究者,关于清末法制变革中,长期存在的以沈家本、董康等人为“进步”,而以他们对手一方为“保守”的认识,值得重新审视。

与严刑酷法相关的是刑讯行为。唐烜对此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认为作为新式审判机构的大理院,应尽量不采刑讯,但事实上,大理院的刑讯并未停止。与唐烜同在刑科第三庭的文需<sup>⑤</sup>,就不时刑讯逼供。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八日,唐烜“连日睹其举动并裁判各事,仍是昔日病痛,且好用刑责。

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七月六日,第306、321页。

②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1420页。

③ 董康:《中国修订法律之经过》,何勤华、魏琼编:《董康法学文集》,第461页。

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1133页。

⑤ 文需,字济苍,满洲人,据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唐烜日记》记载,“济苍向官刑法员外郎。予在山东司主稿时,渠为帮印,相交颇洽,予丁艰后,渠已调他司掌印。庚子联军扰都城后,设局审判地方词讼,渠在局充委员,有能名。廿九年因案被控查办,得降级处分后,近调入大理院。”

本日讯拐案,有十六岁龄之女牵连到案,竟两次掌责,予耳语止之。”次日,唐烜入署后,发现文牒“已提犯杖责讯供矣”,唐烜为此还到详讞处向许受衡(后任刑科推丞)、周绍昌(后任民科推丞)反映,“谈及各庭讯供是否仍用刑责,两君金言不可”,唐还特别“嘱其至明日知会各庭,俾有所限制,应不至残酷者放手无忌也,两君均诺之”。显然,大理院多数人员在禁止刑讯问题上颇有共识。很快,法部也明令“禁用非刑”<sup>①</sup>,但事实上,严刑逼供这套传统时代惯用的审案方法在此后依然延续着。稍后调任大理院“行走”的孙宝瑄,也亲眼目睹了大理院刑讯场面,其日记载:“观讯囚,倏然而敝衣垢面者,相继引入。俄鞭扑交作,呼声极惨。”<sup>②</sup>

现代司法注重程序,但此时新的司法程序大体上未付诸实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一日,唐烜赴东城预审厅,未见所要找的人,但“遇有一债务案,两造均传到,无人讯办,予随唤入讯诘”。既然原被告双方都到了,想必预审厅事先已告知他们,但原被告都到庭了,审案人员却没到,最后由临时出现的唐烜审理。这很可能仅是一件轻微的民事债务纠纷,但也足窥京师基层司法事务无序、散漫之一斑。唐烜所言“随”字,值得琢磨,其与现代司法讲求的“程序”很不协调。

在司法改革前,刑部现审案件绝大多数系徒罪以上案件。原则上,徒流军遣罪案件,由刑部自行审结,死罪案件,须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大清会典》规定:“凡刑至死者,则会三法司以定讞”,易言之,“罪应斩绞之案,会同三法司核拟具题”。<sup>③</sup>《大清律例》吏律(同僚代判署文案)条例规定:“刑部遇有三法司会勘案件,即知会都察院、大理寺堂官,带同属员至刑部衙门秉公会审,定案画题。”<sup>④</sup>根据参审官员级别,三法司会审可分为“会小法”与“会大法”。长期供职刑部的唐烜,对这些司法运作模式自是熟谙,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唐在日记中详细载述了三法司是如何会审的,及其在官制改革后是如何演化、消亡的:

凡定拟死罪人犯,向来三法司会讯。其制则于刑部定案后,行文都察院、大理寺两衙门,定期会讯。至日,则副宪、少卿各一人至部,部中各堂均到,延入白云亭坐定,呈上各犯供词,按名提犯,跪听书吏在旁朗诵该犯原供毕,即持下,另易一犯,犯皆无言;方带犯时,用两青衣皂夹持之,盖银铛在身,不便行走也。若立决之囚,皆于具奏之前一日会讯,俗名谓会大法。所谓会大法者,以先有会小法也。凡部中罪犯,由本司讯明画供后,即行文都、理衙门,定期会讯。先是本道御史及大理寺丞过部中,在本司阅犯供,提犯上堂,书吏诵供毕,仍会该犯,手画并印记毕,带下收监。若犯人有翻异,则俟两员散去后,重新提讯,必令输服无词,始再发行文,定期另会大约。会小法时犯人间有狡供者,至会大法则不复翻异矣。自去年改官制后,大理院为裁判最高衙门,且系独立,而三法司向来核议会审之制悉废矣。故凡死罪犯,只于各庭画供后即定案拟罪,俟将具奏时,堂官提犯至诵供如旧式,名为亲提,即奏中所称“臣等覆亲提研鞫”也。

丙午官制改革主要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但此举已根本变革了传统司法体制,包括三法司会审制在内的许多传统司法模式为之一变。如《清史稿》载:迨光绪变法,三十二年,改刑部为法部,统一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配置总检察厅,专司审判。于是法部不再掌现审,各省刑名,划归大理院覆判,并不会都察院,而三司之制废。<sup>⑤</sup> 政治体制变革之于法制转型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① 《法部禁用非刑》,《北京公益报》第269号,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第2版。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1122页。

③ 《大清会典》第53卷,第1页,转自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④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九,刑法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15页。

## 五、士风、仕气与司法执业

传统士人多以观风颀国为己任,唐烜也不例外。他察觉到清末士人多刻意求新、求异,且不好读书:“近日,论学者皆刻意求新,作未经人道语,又好诋謫前辈,皆不读书之过也”(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近十年来,有志者,醉心欧化”(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士风如此,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在晚清的变动密切关联。唐烜观察到,在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各有业,而士独先于四民者,以所操之业尊,而工商者皆待治于士者也”,易言之,在传统四民结构的社会里,士为四民之首,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分配给民众的社会角色是追慕。但现今状况大变,“后世士风里,假其业往往不足以自达,而有夤缘攀附苟且之行以求快于一时,所谓文章气节扫地尽矣”。作为官僚来源的士人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官员与官场,可谓士风与仕气相互作用。唐烜察觉到:“古之为仕者,皆士之业成者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今乃自为士之时,即挟一诡遇之见,则士之业,从可知矣,士之业既可知,固无怪今之为仕者,苟可以利达,虽自处于苟贱不廉之地,亦毅然为之也”,故唐感叹:“今天下无士矣,仕途安可问哉。”(三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确定并公布后,接下来就是各部院机构的重组,人员的去留是官员们的关切所在,一时间人心浮动。唐烜感觉:“自改官制之谕旨颁后,朝士多有三月无君之惧。”(十月九日)各人无不利用各种门道谋求出路,“各衙门司员鼎沸数月,至今未已。其大力者,则极意夤缘纳贿乞怜,无所不至,总以蹀进而垄断为目的;次者,亦舍旧图新,惟恐不及。”因此,他感叹曰:“噫!朝廷方以励精图治为心,乃适成臣下市恩干泽之愿,世风如此,尚忍言哉。”(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胡思敬晚年的回忆证实唐之所言,胡氏说:清末改官制中“奔走小吏夤缘辐辏于公卿之门,投其意向所趋,高者擢丞参,次者补郎员,人不能责其徇私”。<sup>①</sup>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唐烜与在畿辅学堂读书的三儿谈论科举、学堂、士风等问题。在晚清,士风日下,一般人皆归咎于科举制度,解决之道是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士风之不振,论者咸归咎于科举……盖以停科举而专力于学堂,始可渐图自强之基也。”但在唐烜看来,学堂与科举其实无甚区别,他说:“庸知今之学堂,犹昔之科举也”,并对此分析曰:“科举之所以弊者,人人皆存侥幸之心耳,暗中摸索一日之长,立致青紫,故往往经史皆束置高阁,只熟读烂墨艺数百篇遂登上第者,并有胸无点墨纯事抄袭亦得人榜者。乡会试之集于京师者,数千大万人,孰不希冀一得哉。幸而得无得之者,不自知其为幸也。天下多一幸进之人,即少一实学之士。久之,而趋实学者,群笑其迂,亦从而变计矣。”推而广之,农工商者也“各怀一幸心以立于世界中,安得不尽归于败坏耶”。缘此,整个社会风气日渐败坏。

如此士风、仕气明显地表现在唐烜置身其中的司法机构里。唐观察到其所在的大理院刑科三庭同僚多不安所业,心猿意马。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唐记述道:

自予莅任第三庭,庭中同僚共九人。二帮审金冯两君,三录供编案刘范王三君,外有二行走,则闵赵二君。唯冯君系法部旧人,余皆他衙门所调者。然冯君,系由孝廉捐纳到署,在部近十年,每日来庭从未见其著手公事,亦不知其明暗何如。金君,人极聪敏,又西洋毕业生也,唯不习法学,且已经奏留商部矣,渠之来特流览之助耳。闵君,亦孝廉,年少美才,亦兼外城巡警厅差使,不能兼顾。赵君,喜用功,志锐而才敏,然在署兼医官,又兼外城医院功夫,万难久靠。

<sup>①</sup>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页。

刘范王三君,皆大理寺旧僚奏留者。中唯刘君肯用心趋事,亦果闻其先已报指知府,年内外即想分发出京。范君,人极谨饬,而向习俄文毕业,兼某部翻译官差使。王君,年甚少,文义不甚深造,到署往往略坐辄去。此三庭办事诸僚友之大较也。

唐烜所列同僚中几无人安心任事,这样一群司法官可谓“貌合神离”;不安所业之外,且多为“外行”。唐直言:同僚中的冯、金、闵三人“皆外行,不甚谙律例,以为只可曲法也”(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由如此人等组成的司法队伍,执业中自然问题百出。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大理院在致法部的公文中把“斩”误写为“绞”,“一字之误”导致大理院与法部又起矛盾。<sup>①</sup>唐烜对此感叹道:大理院“新设各庭,除正审官外,大半由夤缘而来,或调自外衙门者,或调自京外官者,即法部旧人亦非平素勤事者流,一概茫如故,致此笑柄。”(七月二十二日)一个多月后,唐再言:“冯(采臣)君在法部将十年,调院已半载,于日行公事尚不可靠如此,近来人才可知矣。”(九月一日)

这些既外行又不安心审判事务的人员为何会聚集在大理院呢?原来他们所思所图的仅是品秩、缺位,而非审判事务本身。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唐烜到大理院,听闻“署中已拟定补署各缺,明日将具奏”,这是署中人员最为关心的大事,唐感觉“阖署人员累月悬望,心旌摇摇,至是欣戚各半”。对此,唐深感失望,说:“自去秋改制以来,中外悬望措施,今颓败至此。入其中者,犹日夕营营唯差缺之是求,不得则攒眉缺望,而忘己身之短长优劣,甚至不知律例为作何用者。”七月三十日,唐入署,又得知“堂定奏署推事典簿主簿各缺,共推事六人,典主各一人”,此次拟补推事六缺,原拟为胡、孙、冯、涂、欧、林六人,且“已具考语画稿会衔法部”上奏。但这时,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将林君衔名撤下”,唐也“不知何意”。鉴于唐与刘的特殊关系,署中诸君都劝唐向刘说项,让林君也能如愿补缺,但刘态度很坚决。在这种情况下,唐烜“大窘汗出如津,不得已,始正言告诸君,云:‘此乃极要公事,安有以私情干者,且用舍进退,堂官自有权衡,成竹在胸,岂能以数语挽回者,不第无此政体,亦徒费唇舌,自取侮辱。’诸君谅之,于是议始罢。”此事虽罢,但让唐感慨仕气之坏:“噫!近来专讲速化,凡厕身新署者,皆以升补为捷径,稍有不遂则怨抑形于词色,而职业之能否胜任,固无论也。”唐烜之言可谓道出了司法执业现状的症结所在。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唐烜听闻“正班简放院推丞之信”,刑科推丞为许受衡,民科推丞为周绍昌。许、周二人去岁“始补主事缺”,主事是六品官,今年就升任四品的推丞,擢升如此迅猛,除本人努力“夤缘”、“大力者”背后运作外,官制改革前后任人无规则、紊乱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此,唐烜认为:许、周二人的任命乃“乘时藉势之利也”。相比之下,唐烜确实不善于夤缘、钻营。他自道:“予通籍以来,从未尝向人营谒。即调大理院后与中鲁不时晤叙,未曾涉及公事一语,中鲁尚知我,亦不以私情相酬答。数月中,如详谳处总核,人皆视为美差(亦其可保推丞也),予则无一念及之。”(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唐烜此言未可尽信,但足见唐颇为清高(或因无奈所致),故当他得知自己也列名补缺名单中,系“正五品”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笑置之”(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史载唐烜其人“性沉默,深自韬晦”<sup>②</sup>,考诸史实,应大体不差。据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唐、恽最迟应在光绪三十三年即有交往<sup>③</sup>,但直到民国三、四年,恽才知道唐“学问博雅,闭户吟哦,世鲜知者,余至去岁农会常聚而始知之”。<sup>④</sup>

① 此次因“一字之误”导致的事件,在外间应流传甚广,以致成为官制改革趣闻之一。徐一士著,徐禾选编:《亦佳庐小品》,第291页。

② 马保超:《河北古今编著人物小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页。

③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第349页。

④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1915年7月22日,第741页。



## 六、结语

作为一名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十分关注,因为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及未来出路;作为一位刑官,面对伴随这场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在多数情况下,他是被动接触新近引入的司法制度的。例如,对诉讼分别民事、刑事案件;依新订诉讼法,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两造均立而不跪等审案方式,他颇感不适,这反向说明,唐烜多半是被动接受新式法制与司法模式。虽然由于现存的唐烜日记时段较短,无法从较长时段考察唐烜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唐烜主动因应这场司法变革的心理与举动不多。缘此,亦可推断,官制改革后,已身为现代、新式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不出传统、旧式刑官的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而非现代法学,司法推理、审案方法也变化无多,变化最大者,莫过于身份与官名——从刑官变为推事。

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新式司法制度的引进,产生了“新式”司法官,其实这只是职业身份的变化,可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实质上的转变则是渐进的、缓慢的。历史变迁往往如此,即使在过渡时代或激变时代,也常常如此:制度的移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操作此制度的人员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或新旧参半的。

就个体生命而言,唐烜有其特殊性。他为进士出身、高学衔者,在刑部当差多年,勤勉有加,大体可算合格的刑官,且为实缺官员。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实缺人员相对容易获取新官缺,因此,唐烜在调往大理院后,很快就成为正五品的实缺推事。<sup>①</sup>唐烜个体情况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清末司法改革第一阶段中<sup>②</sup>,新式司法官群体(尤其是大理院和京师高等审检厅)多为拥有传统功名者,且高级功名者比例很大,特别是大理院,进士者占实缺推检人员总数的近一半。<sup>③</sup>与此相对,那些候补候选人员,在此次改制中,压力更大,变数也更大,他们更多的需要靠“夤缘”、“奔竞”等常规制度以外的途径才能谋求新缺。毋庸讳言,清末整体的官员选任规则的败坏、人事制度的紊乱,加大了官制改革中人员变动的可能范围,也加剧了“夤缘”、“奔竞”之风。

丙午官制改革是清朝体制内的改革,对类似唐烜这样的体制内人员而言,虽事关切身利益,但多半是职位官缺的变动,失去饭碗的可能性不大,仅是饭碗里饭菜多与少的问题。五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倾覆,政权更迭,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帝国嬗变为民国,使他们面临真正的威胁,很多人失去饭碗。民国元年,现代中国的首批司法官面临着历史的抉择,留任还是去职?唐烜最终选择了去职。他在赠别法曹僚友的诗中吟唱:“华清宫畔人初散,王谢堂前燕别飞”<sup>④</sup>,心境略显悲凉与感伤。去职,多半是没得选择的选择。

〔作者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谢维)

<sup>①</sup> 前文曾述,清末在新设衙门升迁较为容易,证诸唐烜个体情况,也大体成立:光绪三十二年唐烜为刑部从五品员外郎,调任大理院后,三十三年即升任正五品推事。

<sup>②</sup> 若从司法人员结构变化角度观察,大体可以宣统二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司法官考试为标界,把清末司法变革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宣统二、三年为第二阶段。

<sup>③</sup> 拙文《制度变革与传统身份的现代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未刊稿。

<sup>④</sup> 唐芸海:《虞渊集注》,第9页。